

《读书杂志》成为哪14位学者求新知的阵地

谢华

静泊在闹市中的文化『桃花源』

本报记者 刘帝恩

一名党员，退休后如何为社会和他人发挥作用？这个问题，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答案。5月6日，《文化周末》记者来到位于任城区博古庄社区的一处僻静之地。在老城区那个拥挤、热闹，充满着市井生活气息的路段，一面红色牌匾，在讲述传承红色文化、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。

这是一座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展馆，5个展区分为红色教育碑林、雷锋纪念馆、国学教育碑林、孔孟儒家思想碑林和齐鲁传统民俗文化收藏。

2011年，退休党员刘汝彪来到这里，历经12年从未间断一天的建设，这个展馆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。

《文化周末》记者在现场看到，正门口是一方长3米、宽1米的巨大石刻，上面镌刻着“中国共产党章程石刻展馆”。步入其中，除了题材、内容丰富多彩的石刻之外，记者沿线观赏的同时，也发现了这个展馆的别具一格，那就是红色文化、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融合，以及带给观者与众不同的最贴近生活的体验。

当时这个废旧的厂房，在别人看来十分破烂，但刘汝彪却看中了这个地方。他和他的朋友们，一心要将这里改造成一座展馆，并按照不同的内容进行划分。

1958年，刘汝彪出生在当时的济宁市许庄公社。1979年，21岁的他应征入伍。1986年，从部队转业的他，被安排在市政府办公室从事技术工作。3年后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刘汝彪年轻时酷爱书法，参军后，除了钻研后勤保障等技术，还承担着文化宣传工作。他擅长楷书，一有时间就沉浸在临帖、创作之中，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、省市各类书画展，入选编辑获奖多达29次。

从一名战士，到参加地方工作，再到光荣退休，四十多年来，刘汝彪始终有一个梦想。他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，他希望用一种独特的方式，传承历史文化，弘扬革命传统。人老了，更要为社会、为大家做一些有益的事。

2011年，刘汝彪结识了嘉祥县石刻艺人杨则庆。看着一件件精美的雕刻作品在杨则庆的手中呈现，刘汝彪就下定决心，自费建一座红色石刻纪念馆。

刘汝彪特地选择毛泽东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，作为他的首方石刻。由他精心选材，精心书写，在杨则庆长达一周的合作之下，第一件石刻作品问世了。此后，他一发不可收。《济宁古八景》《三字经》等等，都成为他要雕刻的内容。

2016年，刘汝彪开始筹划制作红色文化专题石刻。历时两年，终于完成了六十余方党章石刻，展馆内还陈列了宪法等专题石刻近1.7万字，党内监督条例、入党誓词、入党誓词等石刻以及古典诗词、国学文化名句、济宁民俗陶文石刻等，共计1000余方。

这些作品的石材，均来自嘉祥县，每块重约百余公斤。刘汝彪说，自己时时刻刻保持锻炼的习惯，就是在搬这些石材和创作的时候能多出力。这些石材的背后，有着一位老党员红色的、灼灼的心。

刘汝彪的每一天，都会沉浸在自己建造的展馆里。他喜欢在这座党旗、国旗、军旗映红的巨大空间里徜徉着、流连着，甚至不停地搬动、修整、拾掇，这里有他年轻时的梦想和燃烧不尽的激情。

刘汝彪热爱这里的生活，以至从未停歇的设计、看管、讲解这里的红色文化以外，又淘来了不计其数的各年代锅碗瓢盆、老织布机、古今家居农具，甚至令人叹为观止的电话交换机……一个个老物件，承载着华夏沧桑的文明，也成了最接地气的展出，让观者感悟、传承之际又倍感亲切。

这是刘汝彪在难得的闲暇中“收来”和“搜到”的数以千万计的展品，包罗万象，林林总总，不少老物件早已被人遗忘了，但在这里都能再现历史和绵延的文明。

在新开辟的展区，刘汝彪指着长案上的10个石磨说：“这是为逛展的小朋友准备的生活体验展品。通过体验磨豆子的过程，大家会对农业生产和过去的日常生活，有一次更加深刻的了解，以后会更加热爱劳动，珍惜粮食。”

这其实已经成了展馆的另一个核心内容，也使展馆意外地增加了农耕文化、民俗文化的现场体验平台。这个想法由来已久，但一直没有明确。爱动手又爱动脑的刘汝彪，多方咨询专家学者，也动员了越来越多的公益人士，为展馆出谋划策，指点迷津。

旧家具，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展馆里竟也不乏“蜜蜂”牌缝纫机，体面的旧式嫁妆，老黑白彩色电视机，甚至1986年还在用的农村版大冰糕箱子。刘汝彪乐呵呵地介绍说：“这个箱子能装二百多个冰糕，比城里的冰糕箱子要大许多。因为那时候批发一次不容易，就得多装。”

随处可以感受的乡愁，数不胜数的农耕器具，让城市中长大的青少年感到稀奇，就连今天的农人也未必见过。更不用说，那些小木船、渔网、虾笼，重复着渔民的生活轨迹，大到腌制酱菜的巨缸，小到历代的针头线脑、烟盒、油灯、瓦罐，都让大家倍感遥远的温暖和浓浓的烟火气。

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动动手指，世间万物就呈现在屏幕上。但刘汝彪还想到了，手机里固然什么都有，但许多东西是需要实体的。没有实地、实物的接触，怎么回望过去，畅想未来。他有了新的想法，这样的公益展馆，不仅要有深刻的教育意义，还需要独特的体验功能，才更有利于弘扬崇高的精神，而伟大的精神都是从实际行动开始的。他要让这个座落于闹市的“桃花源”，建造成人人都能找到乐趣，更可以实现感悟和提升的文化体验平台。



民国时期的读书类杂志，是随着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和报刊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些杂志大约有三十多种。由于它们广泛的影响力，为我国的书评、出版事业，以及指导大众读书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但目前对于这类期刊的研究总结尚不多见，窥见红色报刊史料研究中心馆藏的读书类期刊，并以此作为研究背景进行分析，可以从中得到借鉴。

1922年5月7日，《努力周报》在北京创刊，1923年10月31日终刊。这份报纸由胡适主办，当时的影响很大。借助正刊的影响，1922年9月3日《努力周报》发行了增刊，题名《读书杂志》，目的在于鼓吹国学与指导青年读书，引导大众读书。这或是因为《努力周报》创刊艰难，先是被警察厅设法批驳，后被女房东敲竹杠，说他们办报是发财的事儿；而且《读书杂志》的创刊与此不无关系，胡适在日记中也写道：“我们大的仇敌，不在武力，不在官僚，乃在‘无明’。”

《读书杂志》的发行，并未随着《努力周报》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，而是持续到1924年2月停刊，共发行18期。这18期《读书杂志》刊登了44篇文章，涉及14位学者，他们分别是胡适、顾颉刚、刘挾葵、梁启超、陈衡哲、胡董人、钱玄同、陆侃如、丁文江、吴虞、董作宾、游国恩、徐旭生、任鸿隽。当时，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。之后的历史证明，这14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学史、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这些人或是名门之后，或已然名声显赫，且看一下《读书杂志》创刊时他们的年龄、职业和所撰写文章的内容。

胡适，31岁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，他发表了《读楚辞》《西游记考证》《古史讨论的读后感》等考证类文章，曾得到鲁迅的帮助。其中《读楚辞》一文，引导着刊物物风格的走向。特别是在1921年11月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中，总结出著名的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作文之法。

顾颉刚，30岁，北京大学国学门助教，他的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》发表后，对国学大家文章的质疑与辩驳产生影响，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、刘挾葵、胡董人、胡适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，胡适、钱玄同与顾颉刚为“疑古派”，胡董人、刘挾葵为“信古派”。

在具体的讨论中，顾颉刚开其端，刘挾葵与之辩难，往来讨论五个回合。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，“我初到北京，下月又要到河南，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”，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。

紧接着，胡适在第18期撰文《古史讨论的读后感》，做总结发言，表达自己疑古立场。遗憾的是，刘挾葵在发表第5篇文章《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（续）》后，因论争平台《读书杂志》的停刊而告终，刘文未见再续，颇为可惜。

刘挾葵，24岁，东南大学史地部副主任，他的《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》在第13、14、16期发表后，与顾、刘、胡的论证中，几句闲言，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及品格，不妨择数句以飨学人。

顾先生说：“读刘挾葵先生‘再质’一文，使我非常欣喜。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，现在竟得到了！”刘先生言：“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，觉得先生（指顾颉刚）所说俱不能成立；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，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大篇一笔勾销，以表示我毫无成见。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，我所不安，不敢不吐……”

胡先生《读后感》说：“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，我也不用讳饰了。但我对于刘挾葵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，是十分佩服的；我对他的批评，全无恶意，只有责备求全之意，……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，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。”

顾先生与胡先生的真诚溢于言表，而刘先生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。刘挾葵早年早逝，从其留下的《中国上古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等讲义，以及发表在《史地学报》中的《史法通论》一文，可窥其坚守“信古”之志。在“疑古”之风大兴之时，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，颇显学者风范。

梁启超，50岁，清华大学教授，他的《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》全面介绍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。他认为，虽然舜水之学没有近代中国产生影响，却在异域开花结果，成为近代东亚最为耀眼的文明成果——明治维新的思想源头。通过密集的介绍与宣传，梁启超为国人塑造了一个完整生动的舜水形象，并使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。

陈衡哲，33岁，东南大学教授，创作《研究历史应具的常识》，在这之中的陈衡哲是唯一一位女性，一生拥有很多头衔。她曾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硕士，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。人际圈中鸿儒、高官、学者、作家皆有。

在重庆时，陈衡哲曾应周恩来之邀访问过红岩村。她的丈夫任鸿隽一生成绩卓著，长女以都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，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，儿子以安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。她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西方史学方面，有《西洋史》《欧洲复兴史》《文艺复兴小史》等著作。

胡董人，40岁，上庄毓英小学主事，他的《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》文中认为：“《生民》是郊祀的乐歌，所以提后稷‘缙禹之绪’而不提禹，并不表明没有禹的观念；禹为九鼎动物之说荒谬至极，明代可能不会有九鼎；而且《尧典》不见得是假，‘古史官是世传的，他们父子相传，子孙传孙，容易把史料保存。就是突遭兵火，他们在职务上关系，不能不设法搜辑。列国国有史官，一国失传，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，决不能各国同时对于某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话’。”

钱玄同，36岁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当顾颉刚提出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”，在史学界激起“古史大讨论”时，他又立即发表《答顾颉刚先生书》《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》二文，对顾颉刚表示公开支持。

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，首先体现于他一再鼓励顾颉刚要勇于“疑古辨伪”。他明确肯定顾颉刚这一见解“真是精当绝伦”“希望先生用这个方法，常常考察，多发明，廓清云雾，斩尽葛藤，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”，并提出：“研究国学的初步便是辨伪”。

陆侃如，19岁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，他在该刊发表了3篇文章，发文数量仅次于胡适、顾颉刚、刘挾葵三先生，与陈衡哲并列第4位。《大招，招魂，远游的著者问题——〈屈原评传〉“余论”之一》，胡适在文后的按语所云：“陆先生这篇考证是很有价值的著作。他虽不肯否认屈原的传说，但他证明《大招》与《远游》是东汉时人的作品，他用的方法很精密，使我们很佩服”，更是肯定了上述推断。

《读〈楚辞〉》，关于此文的写作，文中开篇即言系胡适将《读书杂志》第1期寄给他，让他作批评之文。胡适在《读楚辞》中否认屈原传说，而陆侃如则对陆侃如提出“屈原的传说是不能否认的”观点。

这种论辩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，皆有材料支撑，两文对读，特别精彩。《宋玉赋考》等，对于一个19岁的学生而言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而文章之所以发表，主要是因为其文风格与办刊宗旨及主编胡适品位较为一致。这种学术互动式交流为较为完备的终结，呈现出的动态过程有利于检验实证研究的对与错，其独立之态度，缜密之思维，厚重之积淀在讨论之中随之呈现。

丁文江，36岁，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，他在《重印〈天工开物〉始末记》一文中如此说：“民国三年余奉命赴滇，调查迤东地质矿产。读《云南通志·矿政篇》，见所引宋应星著《天工开物》，言冶金法颇详，因思读其全书。次年回京，遍索之厂肆，无所得；询之藏书者，皆谓不知；阅四库书目，亦无其名。惟余友章君鸿钊云，曾于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中一见之，乃辗转托人就抄，年余未得报，已稍稍忘之矣。今年迁居天津，偶于罗叔樞先生座中言及其事，先生曰：是书余求之三十年不能得，遂以古钱若干枚易之。君既好此，当以相假。”

吴虞，51岁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，他的《荀子之政治论》阐发了荀子的政治观、天道观

与人性修养学说，对荀子的学说作了高度的评价。

董作宾，24岁，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。胡适《西游记考证》发表后，他作《读〈西游记考证〉》，为胡文提供诸多补充材料，胡适又在董文后附录“后记”。

游国恩，24岁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，《荀卿考》。自此，开始迷上了楚辞，潜心投入，写下《离骚研究》《天问研究》等论文。

徐旭生，35岁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《天问释疑》。他是一位毕生书写“生命之书”的学者。“青年时代的徐旭生精力四射，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，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，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，但偏偏愿干预现实，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，看他在《猛进》上的文章，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，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。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，讽刺章士钊、陈西滢、杨荫榆的短章，几乎与鲁迅相同”。徐旭生与鲁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时常通信，相互激发。

任鸿隽，47岁，中国科学社理事长兼社长，发表《评汤炳生的科学大纲》等有关古代文化、政治哲学的文章，在当时都具有重大影响。

特别是《读书杂志》第7期发表胡适的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一文，列了近百部数千册的古书，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并刊有胡适对康白情诗集《草儿》与俞平伯诗集《冬夜》的评论。

以上这些人中最长者吴虞，51岁；最小者陆侃如，仅有19岁。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多以文

史考证为主，兼论古史。18期的《读书杂志》每一期都有亮点，特别是当时学人之间的一些学术论争，从文章风格以及按语之中可窥得若干端倪。《读书杂志》的学术性强，但亦不乏趣味性。

胡适在第1期《发起“读书杂志”的缘起》一文提出两点缘由，可视为此刊宗旨，一是“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大家的批评”，二是“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——大家少说空话，多读点好书”。这两点，在整个刊物中被贯彻得很好。

在《读书杂志》中，胡适、胡董人、刘挾葵、钱玄同、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讨论，形成15篇文章，近九万字。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于于众，颇有一种追求科学精神的担当，各种论辩困难尤为精彩。后来的研究者，对诸位先生讨论古史问题也有颇多关注。

《读书杂志》虽以增刊之名，却行读书之实。“疑古”“信古”之争发端于此刊，以“疑古”之胜告终。如此内容丰富的“增刊”，在交流读书心得、学习体会，引发国人读书兴趣，探索科学之古史系统，对古籍的考订、诠释，对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中国史学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①胡适、顾颉刚、刘挾葵、梁启超、陈衡哲、胡董人、钱玄同、陆侃如、丁文江、吴虞、董作宾、游国恩、徐旭生、任鸿隽

②1922年9月3日《读书杂志》创刊号第1版

作者藏品资料图片



71005